

俞佐萍方志论集

俞佐萍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98
K290-53
13

✓

俞佐萍方志论集

俞佐萍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3 0000 0574 8

封面设计: 孙 璐
责任校对: 韦 伟

俞佐萍方志论集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照 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杭州武林路 125 号)
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
(杭州玉古路 20 号)
装 订 杭州西湖装订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8.25
字 数 40.5 万
插 页 2
印 数 1 - 1000
版 次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624-5/K · 352
定 价 2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摄于1992年12月

新编地方志，要努力做到：认识
客观事物，真“内容”，记述真“实”，
目的，功绩，用“把这三省统一可
一表”，也就是把认识、反映、记述和改
进自然、社会综合起来，为社会主义、
人民福利、立言，反映历史和现实，
的演变与发展，使书真正成为
为科学、为文学、为教育、为文化、
投身于为苑，钱说，并没有想过
要写或出书，的念头。在修志过程
中，对地方志有思考和研究，也
有某些急需之作，也经仲合
议，有讲过许多次讲话，还到不少地
方、班上、讲地方志课，那都是根据

作者手迹



1990年5月15日在《海盐县志》稿评审会上讲话

序 一

80年代之初,正当新方志事业在浙江萌动之际,佐萍同志自党政机关调来方志战线工作,我们合作共事,匆匆已10余年。10余年时间,对个人来说并不太短;对一项事业来说却不太长。尤其地方志是一项长期具有连续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千万人、几代人为之长期奋斗。佐萍同志有幸生逢修志盛世,加上自己的努力,终于在10余年间,由陌生到熟悉,并成为修志行家。这不是溢美之词,现在可以有书为证。本书所收集的大量文章、发言,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佐萍同志开始修志时,已年近花甲,志苑的东风驱动着他在离休前后,奋力拼搏,全身心地投入。为了修志,他常常不顾寒冬酷暑,起早落夜,深入市县。尤其是一些偏远山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同行们趑趄不前,他总是欣然前往,乐不知倦。在众多的志稿评审会上,对别人的发言,他静静地听、默默地记;当夜深人静,别人入睡之际,他却在迅笔疾书,认认真真,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中肯的评审建议,然后发言,因此受到同行的推重。

本书所刊出的文章,我较为熟悉,因为佐萍同志的发言,绝大部分我都在场,他的文章发表前后我也大多读过。

其特点是结合实际,言之有物,认真分析,条理清晰,具有概括性,更具有可操作性,文字虽不华丽,却朴实可读。这得力于长期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和党政工作的实践有着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勤奋好学和善于思考,能够根据修志的实际需要,适应工作的转变,继承过去有用的经验,扬弃不适合修志的东西,并适当地加以改造,不断取得新知,以适应编纂社会主义时期第一代方志的需要。

《论集》一书给人们的思考甚多,既可以看到一代新志的编纂之道,也可以看到修志以外的东西,那就是一种敬业精神,全心全意为修志服务的精神。这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专业最可贵的精神!

佐萍同志在离休之后,执著追求,克服不少困难,结集出版这本书,说明方志事业在胸中已深深扎根。读文见情,依恋之情,溢于言表。相信佐萍同志身体健康,来日方长,定能为修志事业继续作出努力和贡献。

魏 桥

1995年末于杭州

序 二

浙江是中华河姆渡远古文化发祥之地，历史悠久，文明昌盛。古代文化典籍中史部方记，即椎轮于此。其书代有撰述，至赵宋而形成中国特有的史体方志，至今而益臻繁荣，在史志园地中，百花争艳，奇葩怒放。推探所由，约有数端：一是政府领导有方；二则有专家、学者之协作；三是学术刊物——《浙江方志》之诱导弘扬；四是从事同仁之辛勤工作。景象喜人，实非偶然。

俞佐萍同志长于文史，曾参加浙江修志十有余年，主编《浙江方志》多年。凡所论著灼见卓识，辄有创获，对全省修志胥有指导意义，且多付诸实施。近又辑辑学术论著及言论、书评3卷，编为《俞佐萍方志论集》行世。今拜读其书，首论旧志源流，利病得失，以发其端，且示数典而不忘其本之义；次详论新志体例与具体方案，包括新志意义、效用，侧重溯古以通今，继承与创新，务实求真，严格以求，精益求精等重要问题，以配合当代迫切需要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方志之学；再则评点新志，论长道短，并以刊载于《浙江方志》“方志论坛”栏的评论殿其后。

全国修志大业是祖国基本文化建设之一，近10年来已掀起修志高潮，且硕果累累。惟任重道远，仍需探索前进

之道。佐萍同志之书正适应国家修志形势发展的需要,对省、市(地)、县(市)志和专志的编纂无疑具有迷津指南的效用!

余好方志之学,披阅佐萍同志论著,喜其国学渊源有自,博古通今,高瞻远瞩,立意新颖,精鉴适用,故愿缀数语以介之。

傅振伦

1995年冬,时年九十有一,
识于北京百衲斋

自序

我的一生,可以说有两次大的转折。第一次是1946年,我还在当学徒的时候,结识了一位革命的秘密工作者,以后他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这是从被压迫者走向自由解放,从谋生青年走向革命者的转折。另一次是1984年初,我在中共绍兴、会稽县委和绍兴地委工作4年,在浙江省委机关工作32年后,毅然投身于地方志事业,时年五十有六。我过去一直从事文字工作,也爱好文史,这次虽然只是工作性质的转换,可是在即将步入“耳顺”之年,闯进了一个完全没有涉足过的新领域,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大的转折。对此自诩为“老年出家”,是“老兵新传”。从此开始,我与地方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晚年又为自己谱写了一页新的历史。

我是1984年2月走上地方志工作岗位的。同年5月,早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室正式宣告成立。机构附设在省社会科学院,由副院长魏桥直接分管领导。我为编纂室负责人,和上志邦同志为第一批工作成员,在办公房子也没有一间的艰苦条件下开始创业。1985年1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我们在杭州召开浙江省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政治局

委员胡乔木对地方志工作的指示,省顾委会主任、原省委书记铁瑛到会讲话,建德、萧山、仙居等修志工作起步早的县介绍了工作经验,会上对全省修志工作进行了部署。同年9月,向省委、省人民政府递送了《关于抓紧进行地方志编纂工作的报告》,10月5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根据领导指示,将报告转发各地、市、县和省属单位参照执行。同月13~15日,经过半年多筹备的浙江省地方志学会在杭州召开成立大会,省委书记王芳给会议发了贺信,省顾委会主任铁瑛、省政协主席王家扬到会讲话并被推选为学会名誉会长。此后,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暨学会年会几乎每年召开:1987年3月在余杭,1988年3月、1989年12月在萧山,1991年1月在富阳,1992年7月在绍兴、12月在金华,先后召开全省第二、三、四、五、六、七次地方志工作会议暨学会年会,针对不同时期工作情况和存在问题,总结经验,部署工作。在这期间,还多次召开各地、市志办主任会议和专题会议,诸如:1988年11月,举办以开展学术争鸣、研究志书改革为中心的修志沙龙;1989年1月,召开省辖市、地区志编纂会议;1991年12月,召开修志十周年理论讨论会,等等。省地方志编纂室与省地方志学会合办《浙江方志》刊物,用以交流修志经验,开展学术研究。从1987年开始,地方志系统获准根据社科系列开展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工作。还先后举办4期地方志研究班,3次开展地方志优秀成果和优秀地方志工作者、优秀会员的评选工作。

1991年10月,成立了以省长为主任的浙江省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进一步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规划了全省的地方志工作，尤其对省志的编纂，作出编纂《浙江省志丛书》和《浙江省志（精编本）》的决定。

10 余年来，浙江的修志工作在省委、省人民政府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省社科院的支持和协助，全体修志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成就斐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全省所有市（地）和县（市）普遍开展修志工作，出版如此多的志书，这确为浙江修志史上所罕见。原省委书记王芳曾有“机构较小、花钱不多、成果不少”的赞誉，这一评价在省地方志编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成为共识。志书质量同样获得省内外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赞许，在海外也有较大的影响。1993 年，全国举行首届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评选活动，浙江获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9 项，三等奖 3 项。到 1997 年上半年，全省规划出版的 80 部市志、地区志和县（市）志，已经基本出齐，已付印即将出版或尚在编纂的已属极少数。全省还出版了数以百计的镇志和专志。

这些年来，我主编了《修志须知》资料书和《浙江方志》刊物，合著《浙江方志源流》、《浙江人物简志》（上册）、《浙江在台人物录》，合编《新方志篇目十例》、《修志初探》、《方志功能面面观》、《修志讲座》、《新方志编纂经验谈》，任《中国方志大辞典》、《中国地方志综览》、《浙江省名镇志》、《浙江省名村志》副主编。还应聘担任了《湖州市志》、《台州地区志》以及义乌、磐安、常山、庆元、淳安、平阳、苍南、泰顺、文成、洞头、永嘉、玉环、三门、椒江、嵊泗、岱山、定海、鄞县、宁海、镇海、长兴、海宁等县（市）志，《湖州市文化艺术

志》、《莫干山志》、《龙港镇志》的顾问。为修志，我几乎跑遍了浙江所有县、市，先后 160 多次到各地参加修志活动。

能够参加社会主义时期第一代地方志的编修工作，我深感十分荣幸。当我走上修志岗位时，修志形势和任务十分紧迫，不允许我去脱产学习或进修方志知识，只能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向同行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成了唯一的出路。孔老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而我，凡是领导我的、共事的和与我有联系的所有修志同仁，无不都是我的老师，我真心诚意地向他们学习。几年来，扪心自问，自认忠实于修志事业，尽心尽力，看稿、出差，无节假日可言。我同全省修志工作者一道，面对有志于志、相互学习、坦诚相见、上下求索的修志良好风气，受到深深教育，至今对修志仍怀着无限的眷恋之情。同时，在修志实践中，自己也有一些切身感受，逐步形成对方志的一些浅鄙认识，这里择要例举如下：

一、国有国史，郡有郡书，是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一部《二十五史》，多达 3000 余卷，从纵向记述了我国上古到清代几千年的文明史；地方志，全国编纂多少难以统计，国内现存从宋到民国时期县级以上志书，计 8000 余种 10 万余卷，从横向记述了全国各地自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一纵一横，一线一块，说明中国文化发展传统的“两条腿”走路。实践证明“两条腿”缺一不可。因此深入发掘分散祖国大地的地方志资源宝藏，克服某些重史轻志的错误观念，编纂出高质量、有价值的新志书，在当前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地方志编纂由政府主持,是“政书”、“官书”,具有应有的政治性,有“资治”功能;同时,它又是严谨、朴实、科学的资料性著述,是“地情书”、“国情书”,有据事直书的客观性。编出一部合格的地方志书,既要反对不适当的政治化倾向和宣传色彩,又不能采取超阶级和所谓纯客观的自然主义态度。这一点只能在存真求实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统一,两者不能偏废。

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同时也是修志的思想路线。编修地方志要坚持改革创新,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破除迷信,打破框框,思考问题,探索新路,才能有所发展,有所前进,有所创新;也只有实事求是,才能不唯上,不唯书,真实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才能成为严谨、朴实、科学的资料书,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新方志编纂的指导思想,要解决修一部什么样的志书和以什么思想指导修志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前者涉及志书的宏观设计,包括志书的体例、结构、断限等等,是修志的出发点和归宿,后者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四、资料是一部合格志书的基础。做好资料工作,除了通常所做找文献、查档案、广泛征集外,尤其要注重资料质量,提高入志资料档次,要新,要深,要综合,要有动态性。像丽水地区组织力量对畲族进行全面系统调查的综合考察法,像富阳县对旧志资料进行综合的分类整理法,像宁

波市对重点事物进行实地踏勘和对“宁波帮”进行专题学术探讨的调查研究法,我是很赞赏并倡导这种科学做法的。这对深化志书资料内容,力求资料真实、准确,提高入志资料档次,加强志书著述性,保证志书质量是十分必要的。

五、志书模式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需要而变化,不能抱残守缺,要防止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略地方志本质特征的倾向。本届修志既继承传统体例,但更多的是注重创新,适应时代的需要。市、县志的编纂,大、中、小编兼备,章节、条目体均全,呈现出多彩的局面。以省志而论,历来是通志模式,但从今天的实际出发,我认为旧瓶难以装新酒,而采取分则独立、合则系列的丛书式、多卷本更为合适,这对志书内容的广博精深,编纂任务的落实承担,成志方法的灵活变通,出版发行的迅速便捷,志书功能效益的发挥和实用,等等,都是十分有利的。市志和城市志是两种不同的志种。城市志顾名思义是以城市为记述对象,而今天我国的大多数市,实行市管县(市)的体制,把这种市的市志统称为城市志,是名不符实的。一部完整的市志,其记述范围应包括城市,又应包括所辖的县(市),而城市志却不宜包括市的所属县(市)在内。

六、无论是对历史上的各朝各代,还是对新中国建立以来,都要实事求是地记述成就,又要实事求是地记述失误。志书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有重点有主次,是应该的,但必须求实存真,不能以政治观点作为记述与否的标准,那样是有违志书本质要求的。在记述中,要研究成就和失误

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把它们视为一根链条中的环节,一条历史长河的发展过程,不能把成就和失误孤立、分割,而要达到在记述中显示事物的兴衰起伏,体现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还要注意克服对物质和精神领域史料记述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

七、对改革的记述,要做到改革进程与志书断限同步,改革发展达到哪一步就记述到哪一步,使之与志书断限相衔接、相一致。志书对改革的记述,要紧密结合各项事业发展过程,不能游离于事业发展之外,要力求上与旧体制弊端挂钩,下与改革成果相联,以彰明因果。本届修志中,有人对记述改革不放心,认为改革的试探性与志书的稳定性存在着矛盾,提出“对于未经实践检验和历史考验的各种试验性的东西,要等到从液体状态到固体状态后再加记述”的观点,还有的主张采取“慢三步”或“慢半拍”的方法,以达到志书记述与改革实际保持适当距离。这样做有违“志者记也”的原则,也不符合志书断限的规定,只能是自乱其例。

八、不越境而书,是旧志编纂的一条重要原则,这在今天仍是基本适用的,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也不能固守。诸如,军事上的战略性,经济上的区域性,人口上的流动性,工作上的外向性,使某些领域和事物的记述不得不越出境界,以致越出国外(如记述华侨,与外国城市结友好城市等)。不过,不管怎样,都必须坚持以本县、本市、本省为轴心,相关事物围绕轴心转,不能越无矩。

九、新时期编修新方志,无疑要采用新方法。所谓新方

法,除了随着时代发展采用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外,集中体现在一个“众”字上。众手成志,众口评志,众人用志,是社会主义时代的产物。“众人拾柴火焰高”。本届修志,我们依靠各级组织和众人的力量,集思广益,得益甚多,弥补了修志人才不足、方志知识贫乏的困难,走出了一条由过去依靠少数文人转为组织一支专业队伍(全省达1万余人),志书也从馆藏走向社会的道路。

十、志书的生命在质量,质量的关键在于提高志书自身的存在价值,真正成为科学文献和实用性文献。编纂志书,要注重提高存史价值,提高实用价值,提高科学研究价值。一部志书的质量如何,要以实践的历史的观点,进行全方位考察。第一层次,看志书体例、篇目、结构是否合理,资料是否翔实和确凿,使用图表、照片是否正确、规范,文字表达是否清楚、通顺,印刷装帧是否合格、美观大方等。第二层次,看志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主线,一个地方的历史发展变化的主线,是否体现了;志书史料和著述,是否反映了事物的本质。第三层次,志书出版后,看社会各界的反响和社会效应,是否有利于社会和经济事业的发展,起到一部资料书、工具书的作用,经受得住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三个层次互相联系而不可分割,这是我对志书的质量观。

编纂新方志要努力做到:认识、反映事物贵“真”,内容、记述贵“实”,目的、功能贵“用”,把这三者统一于志,也就是把认识、反映、记述和改造自然、社会结合起来,使志书真正成为传世的科学文献和实用性文献。